

# 文韵周刊



明清时期佚名《会稽山图手卷》(局部)。



唐代三彩女立俑。

## 文物里的唐诗之路

■本报记者 陈黎明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诗歌至唐而达鼎盛。

诗人们从长安、洛阳出发，一路行吟，将大唐的恢弘气象编织成传诵千年的诗篇。随着他们的行迹，从两都至陇右、巴蜀、商於、长江以至浙东，一条条诗路也就此延伸开来。

“路”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风景，又有何等风华？前不久，在新昌县博物馆，一场主题为“唐诗之路”的展览给了我们寻找答案的切口。数月来，这场汇聚全国36家文博机构240件(套)文物的展览，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争相参观，成为热门文化现象。500平方米构建起从盛唐气象到区域文化的完整叙事链。沿着展馆的动线地贴，我们穿行于大唐的器物、诗歌之中，仿佛看见了诗人们意气风发，踏歌而来。

### 唐代诗人的“自驾游”

唐诗之路何以“养成”，路上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？

一幅“唐诗之路主要线路示意图”，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。这幅图由新昌县博物馆馆长张斯鸿带领团队，查阅文献典籍、寻访各路专家，历时一年制作而成。

长安、洛阳、沙州、汝州、宿州、越州……地图上这些古老又为人所熟知的地名，穿越时空走到我们面前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诗的世界。

骆宾王、王之涣、岑参等从长安出发，一路向西北，在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边塞留下无数豪情万丈的壮美诗篇，走出一条陇右唐诗之路；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元稹等人，沿着连接关中与巴蜀的蜀道，走出了一条险峻壮美的蜀道诗路，形成了“天下诗人皆入蜀”的奇观；“六百里商於路”则是当时联系关中与中原、东南的重要驿道，白居易、元稹、张九龄等在古道上游山访贤，走出一条“幽独访神仙”的商於诗路。

如此长线的旅行，诗人乘用的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呢？一字排开的文物或可作为提示。

一件来自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收藏的三彩马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这匹良驹通体以黄、白、绿为基本釉色，抬头立耳、双目圆睁、目视前方，雄壮的背上佩着马鞍，健硕的四腿直立于托板之上，造型生动逼真，为唐三彩之佳作。

相伴于这匹骏马左右的，还有来自洛阳市考古研究院、洛阳博物馆、河南博物院等馆藏的唐三彩骆驼俑、红釉马俑、白陶牛车等。

想必那时，大唐的诗人们就是乘着这样的载具，或往来于中原和西域，或游历名山大川、名城大邑。

从诗句中可以读到诗人们乘骑的记录，如李白在《相逢行二首》中就写道“朝骑五花马，渴帝出银台”。但到了浙东，水网密布，河湖众多，诗人大都以行水路为主，买舟而下，正所谓“舟从广陵去，水入会稽长”“鸣棹下东阳，回舟入剡乡”……

可见，唐人出行的交通工具颇为丰富，有车、马、驴、骡、牛、舟船，还有使用人力的辇、舆等。

在“唐诗之路主要线路示意图”上，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几乎是依水而行。镜湖、若耶溪、剡溪……此间既有“青山行不尽，绿水去何长”的山水风光，也有“蒸豚搵蒜酱，炙鸭点椒盐”的丰盛佳肴，更有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月光如水照松林”的雅集宴饮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诗人对船的喜爱，除了实用性，更因为船的美学意象——客帆远水、秋月钓船、孤棚落日、野渡横舟……舟船已然成为艺术的象征，诗人们的情愫——快意、凄凉、飘逸，更是被揉进诗行间。

### 席卷全国的唱游风尚

一条条诗路，折射出唐代诗人远游风气之盛，亦反映彼时的诗风之盛。

来到一件身处“C位”的展品——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三彩女立俑前，张斯鸿说，长安是唐诗之路中非常重要的起点之一，因此把这件最具

唐代特征的展品设在展览的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展位。

只见女立俑下颌微抬，昂首望天，鬟发垂髻，细长的眉目镶嵌在丰润的面庞上。她上身着淡黄色圆领对襟花衫，双手拢于袖内，拱手于胸前，右肩披浅蓝色帛。黄褐色曳地长裙的裙腰收至胸部，两条蓝色裙带飘然下垂，穿着尖头履的双脚并拢。女立俑的丰腴体态与服饰线条自然融合，展现了唐代女性可爱健康、端庄柔美的风采。

这可不就是杜甫《丽人行》中描述的长安“丽人”？我的思绪不禁飘飞：她是否一直生活在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长安，还是曾仗剑天涯、纵马四海？

本次展厅中还有一件唐三彩非常值得一提，这件来自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三彩女骑马俑，以女性骑马的生动造型反映了唐代乘骑之风极为盛行的社会景象。在唐代，甚至不少女子都有很好的骑马技术，身手矫健不下于男子。

骑乘之风助长远游之风。唐人好游乐，尤以士大夫阶层为最。无论是探亲、访友，抑或是赴任、出使，他们一边沿途游览山川、访古探胜，一边以文会友、吟诗作赋。当时，朝廷也十分鼓励百官利用节假日外出游乐，甚至将鼓励、补贴百官旅游制度化。

彼时的读书人在学业初成之时，也喜周游天下名川，访师问道，广交朋友，过个“间隔年”，以之作为进一步学习与仕进的方式。

生于浙东的贺知章仕前就曾在长安游学访友数年，其间结识诗人无数，常相聚饮酒赋诗。唐代唱游之风日渐成为风尚，在浙东地区同样不例外，此次展览中，相当一部分展品也呼应了这一现象。

来自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的一级文物越窑穿带青瓷壶，慈溪市博物馆的秘色瓷穿带壶等，均为古代便携式容器，主要用于盛装水、酒等，适用于出行、游猎等场景。近观这些“出行神器”，我们不仅直观感受到“夺得千峰翠色来”的美感，也仿佛触摸到了那个壮游成风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一批风骨刚健又天赋极高的诗人从长安出发，游走于辽阔的神州大地，昂首高歌，一路为诗。

此外，唐朝不乏女诗人的身影。“别后相思人似月，云间水上到层城”“欲问相思处，花开花落时”“枫叶千枝复万枝，江桥掩映暮帆迟”……这些优美的诗句，均出自女子之手。

唐代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宽松的文化政策，促进了诗歌的繁荣。而唐代偏重以诗赋取士的政策，则对诗歌兴盛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唐高宗时，进士科加试杂文(诗赋)，到唐玄宗时则进一步变为以诗赋为主。可以说，唐代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。流风所及，稍有文化修养的僧人、妇孺等皆能赋诗。

作为诗歌巅峰时期的唐朝，诗作题材之广泛、艺术之精湛、数量之繁多，为各个时期所难以企及，仅清康熙年间的《全唐诗》所录就“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，凡二千二百余人”。陈中，江油市李白纪念馆藏的明嘉靖二十五年(1546)版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年谱一卷》，祝枝山《蜀道难》手卷等，无不映射这一盛况。

更有趣的是湖南博物馆馆藏的两只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。壶身各有由褐彩书写的小诗一首，曰“小水通大河，山高鸟宿多。主人居此宅，曲路亦相过”“一双青鸟子，飞来五两头。借问缸(船)轻重，附信到扬州”。

这些极有可能是出自匠人之手的即兴之作，散发着特有的民间智慧和生活



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线路图。

温度，至今读来仍令人不禁莞尔，亦可见唐代诗风之盛。

### 名士相聚在浙东

展厅中，一组来自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“会稽县印”及印匣，或许因为铜材质，和周遭温润的陶瓷等展品相比，透着几分冷峻。

印章的印面有篆书“会稽县印”四字，采用隋唐时期独特的“蟠条印”焊接法制作而成，即将铜条作为笔画缠绕成字并固定于印腔底部。印匣两侧有供穿系的耳，匣盖与匣身有锁环对合，可加锁封闭，以防私用或非法钤印。

一枚官印，关系属地民生钱粮和社会治理，也关联着馆驿等处所的管理。

馆和驿原本功能各有侧重，至唐时，二者功能逐渐合流，成为提供交通工具及食宿的站点。唐初，出行使者和官员须持有政府颁发的传簿(后改符券)才可“乘驿”或住馆。眼前这枚县印，想必做过不少“认证”工作。

唐代浙东馆林立，文献可考者就有近二十处，不仅数量多、规模大，而且水陆相兼。这些馆驿之中，自然少不了一个个穿梭于浙东的诗人背影。白居易《宿樟亭驿》、丁仙芝《剡溪馆闻笛》、郑巢《泊灵溪馆》……暂宿的大唐诗人们，留下不少和馆驿有关的诗篇。

从“馆驿入诗”这一线索切入，新昌本地学者竺岳兵研读《全唐诗》发现，有450余位唐代诗人到过浙东地区，占《全唐诗》中诗人的五分之一，留下1500多首诗篇。浙东何以吸引这么多唐代诗人？

要寻找答案，不妨先把时间的指针拨到公元353年，东晋永和九年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聚会发生了。那天是三月初三上巳节，42位东晋名士相聚在会稽山，修禊、饮酒、赋诗。这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兰亭雅集。

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在兰亭雅集之前，还有一场“聚会”在剡东地区上演。张斯鸿



“唐诗之路”展览现场。新华社发(张瑞 摄)



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。

唐代越窑穿带青瓷壶。



唐代三彩莲花形口乳钉纹盖。



唐代三彩女骑马俑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新昌县博物馆提供

结合元代诗人张翥的诗作《寄越能仁用章俊禅师》，将这次相聚称为“沃洲胜会”。

巧合的是，在兰亭雅集上处于“C位”的王羲之，也参与了“沃洲胜会”，但只能居于末位。这不禁勾起了大家的兴趣和疑惑：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聚会，能让“书圣”甘居末位？

白居易在《沃洲山禅院记》中提到，有竺法潜、支遁等十八高僧和戴逵、卫玠、王羲之等十八名士游憩、栖隐于沃洲，胜会空前。这样的豪华阵容，难怪王羲之会略显“黯然”。

事实上，“沃洲胜会”鲜有史料记载，是否为真实场景尚待考证，但指向了一个不争的事实——彼时各地名士汇聚的盛况。

魏晋以降，北方战乱频仍，人迹罕至、山道路少的剡地，成了可以避灾的“福地”。随着大批中原土人迁入，以戴逵、王羲之等为代表的众多名士云集于此，剡地成了人文荟萃之地。

“夫有非常之境，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。”兰亭雅集后两年，即永和十一年，王羲之弃官归隐剡东，在明山秀水间交游友、娱乐山水、品酒茗，“又与道士许迈共服修食，采药不远千里……穷诸名山，泛沧海”。

魏晋风流，余韵流长。几百年后，一众“自爱名山入剡中”的大唐诗人，或追慕先贤，或探幽访胜，或寄情山水，纷纷泛舟而来。“唐诗之路”上，诗人们一路载酒扬帆、翰墨寄怀，实际上也是一场跨越几百年的文化寻根之旅。

今天，当我们踏上浙东这片土地，无论是在展馆前静静驻足，与文物来一场静静凝视，还是叩访天姥山，在奇幻仙境中畅想李白天姥吟留别时的场景，又或是来到钱塘江畔、剡溪畔，登上天台山上，探寻婉转于时光中的诗意，唐诗之路这幅绮丽的文化长卷，定能在古人今人的“对话”间，落下新的一笔。

### 延伸阅读

## 斑斓的唐三彩

唐三彩是唐代低温彩色铅釉陶的通称，亦指唐代陶器上的釉色。

所谓“三彩”即多彩之意，包括黄、绿、白、褐、蓝、黑、紫等多种色彩，有的单一色，有的多色混合使用，而黄、白、绿、三色在三彩器中最为常见。

唐三彩是在汉代铅釉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，三彩器始创于唐高宗时而盛于开元年间，多用作随葬器，在河南、陕西等地有大量出土。因唐三彩最早出土于洛阳，且此间出土数量最多，所以也有“洛阳唐三彩”之称。

有趣的是，史料中有关唐三彩的记载很少，今人对其认识始于一次“意外”。20世纪初，陇海铁路修建至洛阳邙山时，在发掘的唐代墓葬中，第一次发现了唐三彩。自此，这个已经沉睡于地下一千多年的瑰宝，终于重见天日。

事实上，唐三彩不只是陪葬使用，也应用于日常生活。

按照分类，唐三彩主要有俑类、器物、建筑和生产工具模型、琉璃瓦和瓦当等。其中，占比颇高的俑类又可分为人为和动物两类，人物类形象包括天王、武官、文吏、贵妇、女侍、胡人、乐舞、杂技等，动物类形象有马、骆驼、牛、羊、麒麟等。此外，还有樽、壶、瓶、罐、碗、盘等盛器类。

2008年，唐三彩烧制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如今，相关主题文创产品中，不乏融入现代审美元素的唐三彩衍生作品，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。

“唐诗之路”展览中，唐三彩类文物占比颇高。如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三彩女立俑、三彩建筑模型，洛阳博物馆的三彩莲花形口乳钉纹盖，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三彩马、云雁纹三彩三足盘、三彩贴花球腹罐、三彩骆驼等，精美的做工、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，尽显富丽堂皇的大唐气度。

(据新华社、国家博物馆官网)